

海淀文史选编

雷洁琼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海淀区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六月

目 录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罗章龙口述 孙薰整理 (1)
在跟随陈老总进藏的日子里	孙美珂 (7)
关于我的伯祖父易象与田汉的一些情况	易海云 (14)
一代林学宗师——郑万钧	唐午庆 (26)
宁死不屈的铁汉子——记吴来和烈士	韩 杰 (45)
北京市第四十七中学史话	许步云 王铁铮 (52)
香山慈幼院党组织的建立和早期活动情况	董辅祯 (68)
北平市委西郊工作团	刘 麟 (79)
回忆解放初海淀区人民政府成立前后的 工作情况	刘 麟 (81)
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记巴沟土改实验村	沈 澄 (87)
海淀区行政区划的变化沿革	沈 澄 胡广琴 郝 杰 魏淑清 (96)
兵匪横行的世界——旧社会冀南匪患点滴	张还吾 (99)
正月十三这一天	齐 心 (104)
孙禹行将军墓	韩 杰 (109)
团城阅武楼述闻	严 宽 (118)
校园述往	王秀华 (134)
是谁为李大钊收尸入殓	张嘉鼎 (143)
教我如何不想她——赵元任情注燕都	董毓林 (145)
四季青乡清墓	冯其利 (149)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罗章龙口述 孙薰整理

这个名称，是后人起的。在过去，无论对内对外都没有用过这个名字，现在既然用惯了，已约定俗成，就还沿用这个名称吧！

一、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

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从五四运动以后，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就自发地组织起来，做些宣传、翻译工作。后来，组成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工作，得到李大钊先生的支持。我们经常聚集在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探讨一些有关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这其中，很自然地涉及到要建立一个更为严密的政治组织。记得大钊先生常提到：“我们应该组织起来，要吸收更多的人参加，只有这样才能做一番事业。”许多同学向往俄国十月革命，向往俄共组织。也迫切想建立类似的组织。我们曾不止一次，不止一个人，也不止在一个地方酝酿这个问题。但真正组织起这个小组，还是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共产国际代表维辛斯基来北京，在李大钊办公室

召集了几次座谈会之后。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苏俄内部许多事情还没有就绪，远东还有白俄捣乱，中俄之间有些问题尚未解决，因而双方也无往来。

直到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国际成立，中俄也开始有了往来。共产国际是支持远东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同时俄国革命胜利后，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之中，因此他们也需要找同盟军。于是一九二〇年五月第三国际的使者维辛斯基偕译员杨明斋来北京。首先会见了李大钊先生。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以后，提高了国际声望，当时欧洲一些国家，渐渐与北大有来往。一是图书的交换，二是北大学生出国留学，只要北大出个证明学习过什么课程，国外大学都承认有效，而其他学校则不承认。

李大钊当时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他写了不少水平很高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公开赞扬十月革命，是我国最早宣扬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维辛斯基首先见李大钊先生，并非偶然，而是他已了解到李大钊的政治态度。二人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他便要求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这样大钊先生就找了我、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少数同学。在北大图书馆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他首先介绍了十月革命，还带了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等，后者是位美国记者介绍十月革命的英文书。他为了使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除带了俄文版书外，还带

有英文、德文版本。维辛斯基在会上详细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法令，如土地法令、工业、矿山、银行等收归国有的政策，工人实行工人监督与管理，苏俄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管理全国经济工作的制度；以及列宁提出的电气化的宏伟规划等。他还讲到在十月革命后，为了解决面临的种种困难，不得不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他谈的这些情况，使我们耳目一新，大家都非常感兴趣。这就使我们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等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的轮廓。

维辛斯基工作很细致，他除了开座谈会，介绍苏俄情况，了解中国情况外，还找人个别谈话，以便了解会上不易得到的情况。他是一个知识渊博，工作经验丰富的人。英文、德文都很好。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问题，很有研究。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互相勾结的情况，也很清楚。关于五四运动，他问得很详细。李大钊先生同他谈得很融洽，对他评价很高。他曾多次勉励同学，要好好学习，要了解苏俄十月革命。中国也应有一个象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我们认为他谈的这些话，很符合我们的心愿，使我们对十月革命，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

维辛斯基当时住在东城王府井外国公寓处。通过几次座谈后，他又约我到他的寓所谈过两次话。有一次谈的话，我记得比较清楚，当我坐下后，象谈家常一样，先问我是那里人？从前读过一些什么书？现在读什么书？

学校现在教些什么？一些青年的理想和前途是什么？我就把学习的情况，看过的书刊，一一同他谈了。同时把我们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也跟他说了，现在我们学习的书很少。他听了就把北大的地址、个人的姓名及通讯处都记下来了。并答应回去以后寄些读物来。接着，他还谈到了俄国在十月革命前，也是非常落后的，维辛斯基是学经济统计的，他对苏俄国民经济的发展的有关数字记得很清楚，谈话中列出数字说明在革命胜利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维辛斯基还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历史，在十月革命前曾在美国学习多年，研究政治经济学，学习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后又游学欧洲，这次来中国前，又研究了中国问题，特别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他很关心中国革命的发展，询问了五四运动以来北大学生运动情况，从《新青年》杂志到北大的教员、学生的思想情况。

谈到中俄两国的国情，从过去展望未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帝俄时代，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要想赶上去的唯一办法，就是采取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正在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最后，还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作了介绍。

维辛斯基谈话辩才横溢，感情奔放。说理内容切实、新颖、动人。他的一席话，使我在政治方面的视野与过去显然不同了。我们憧憬共产主义革命的远景，更是看得真切，因而更一往无前了。

二、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

一九二〇年秋，时间大约在九月底十月初，维辛斯基准备离京去上海。我们在北大图书馆召开了一个会，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大会。他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亲临会议，会议气氛相当肃穆。他首先说明，这次来访，是双方共同的需要，今天参加会议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坚分子，拥护十月革命，积极参加当前革命斗争的先进分子。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

李大钊在会上致词，感谢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怀。还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一定会有收获的。然后，又赠送了一些书籍和刊物作为礼物。

他行前又与我谈了一次话，主要是有关双方联系的事。

维辛斯基在北京工作结束后，由李大钊写信介绍他去上海。临往上海时，还对我说：“我们谈话很有意义”连称：“此行成功，后会有期”。然后握手道别而去。

我们后来果然源源收到从国外寄来的外文书刊。

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分工与活动

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张申府、刘仁静、李梅羹等人，后来加入的有邓中夏、高君宇（即尚德）范鸿劼、缪伯英、吴汝铭、王仲一、宋天放等人。张太雷是个活动家，经常在天津，

是否小组成员，记不清了。当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的骨干分子，参加过工人运动的，后来我记得又有四、五人都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因年代较远，姓名记不清了。

小组开始成立时，工作没有严格的分工，主要活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大家推举李大钊为小组领导人，其他人遇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

后来，工人党员增加了。工作渐渐有了发展，才开始有了简单的分工：

李大钊—小组领导人。

张国焘—管组织、交际。

邓中夏—主持学生、青年与共青团工作。

罗章龙—负责宣传、主编“工人周刊”兼管北方工人运动。

刘仁静—主要搞翻译工作。

当时分工不明显，可以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

1991、1、31

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名单（19位发起人）

高崇焕	王有德	邓中夏	吴汝铭
黄绍谷	王复生	黄日葵	李 骏
杨人杞	李梅羹	吴容论	刘仁静
范鸿劼	宋天放	高尚德	何孟雄
朱务善	范齐韩	罗章龙	

在跟随陈老总进藏的日子里

孙美珂

1956年3月16日，以陈毅副总理为团长、张经武等
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从北京出发前往拉萨，祝贺西
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代表团由中央和各省的一
些首长及民主党派负责人共56人组成。随同代表团前往
的有中央民族歌舞团、武汉京剧团、重庆杂技团和卫生
队。我那时刚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不久，在中直第七医
院（海淀医院前身）工作，也参加了卫生队。由于我是
卫生队唯一的一名眼科医师，因此接触首长的机会相对多
些，能更多地直接聆听陈老总的教诲。虽然时间不长，却
使我永生难忘。

代表团首站到达西安，当地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招待
舞会。舞会一开始陈老总就到了，他伴着音乐，舞步洒
脱，显得十分轻松、愉快。团里的女同志都轮流陪老总
跳舞，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默默地欣赏着他们的舞
姿。老总不止一次地投来关注和询问的目光。又一曲开
始了，陈老总居然走过来叫我：“小同志，为什么不跳
舞啊？”我忙回答：“老总，我不会。”他说：“你会

走路吗？”我答不上来，他看我难为情的样子就说：

“来，我教你。”我无可奈何，羞羞答答地走进了舞池。其实我也略知一点舞步，但由于紧张，两腿发抖，只跳了五步，就踩了陈老总三脚。于是老总停下来，把我拉到他身边坐下，关切地询问我多大了，哪个学校毕业的，干什么工作等等……。我感到十分亲切，紧张的心情渐渐放松了，答话也自然了。当他离座时，给我下了个结论“书呆子”，并告诉秘书同志限期教会我。我没辜负他的要求，经过两个月的勤学苦练，自认为不错了。后来在陈老总回京的告别舞会上，老总又请我跳，我问他：“可以了吗？”他笑着说：“勉强能够60分，还差得远呢！”34年过去了，至今一有机会我还参加舞会，“跳舞不只是为了玩，它可以锻炼身体，也为了更好地工作……。”我一直记着陈老总的这句话。

3月31日代表团到达西宁。陈老总和我们卫生队的几位医师去青海省著名的佛教寺院——塔尔寺参观。车距寺庙还很远，顺风就飘来了一种奇怪的味道，我有些恶心，后来才知道是酥油味。进寺庙不远，我们几个就没再“前进”了。但陈老总在达赖喇嘛的陪同下，仔细地参观了寺庙，并接受了达赖喇嘛敬献的哈达。老总看了我们一眼，当时没有说什么。可是当我晚上去给他看眼底时，他问我为什么不到寺庙里面去参观，我只好说：“有股味道不好闻，想吐”。他重重地看了我一眼，非常严肃地告诫我：“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注意宗教政策。我们这次到西藏，就是来执行中央的民族

政策的。只有团结好少数民族，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呀。”当时我紧张得要死，只是点头，一言不敢发。后来老总笑呵呵地说：“这么一点苦都吃不了，那么到朝鲜战场上，不是要头一个缴枪了吗？”我只恨地上没有缝，否则我真想钻进去了。老总的话虽不多，我却牢牢地记住了，我这次的任务不光是看病，政治任务更艰巨。以后到了西藏，无论是到哪个喇嘛寺，如布达拉宫、大昭寺、扎什伦布寺等，我都按指定路线参观，看陈老总向大小喇嘛发放布施。当我作为代表团主人陪当地僧俗官员宴会时（因为代表团成员只有56人，每席一人都不够，所以医生也参加作陪），我也注意时时不忘民族宗教政策，做到有礼、有节，完成了必要的任务。

离开西宁时，代表团的车队增加了几倍，200多辆轿车和卡车沿青藏公路前进了。虽然北京这时已是春天了，而西北还很寒冷。我们每人领了一件老羊皮大衣，一双毡靴，陈老总也一样。公路路面不平，人坐在车上如同摇篮，晃上一天头晕脑胀。沿途走了两天都看不见人，路两侧不断见到死亡的动物和一些骨骼，没有树，连草都极少。途中没有房子，都是住帐篷，晚上很冷。路越走越高，高原上氧气逐渐稀薄，很多年青人都忍不住了，个个精神不振，呕吐、厌食，用上了氧气。我们几次给陈老总送氧气袋，他都不要。每到宿营地，老总还到各帐篷去看看，问大家怎么样，有高山反应吗？那时我的体力还好，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还能身背药箱重点巡视首长的身体情况。途中，陈老总和我们一起吃

一锅半生不熟的饭（因高原上气压低，水 80°C 就开锅了，当时也没有高压锅，尽管煮的时间长，饭仍不熟），没有菜，仅有罐头，烧的是牛粪，饭上每每飘了一层牛粪灰，但老总与夫人张茜同志却吃得很香。有一天晚上我去为陈老总看病，他告诉我：“早上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否则小心躺下明天就起不来了”，并让我们医务人员向大家宣传。

途中，由于辛苦，张茜同志病了，眼皮也总是跳，使她心绪不宁。吃药不管用，我提出针灸或封闭也许有效，但没把握，可把我难坏了。陈老总知道后，哈哈大笑，对我说：“你怎么给别的病人治病的？就大胆给她治嘛，她也是你的普通病人啊！”我的思想负担顿时减轻了。在老总的鼓励下，我针灸了三次，张茜同志的病就痊愈了。这事之后我又多了一个“帽子”——“胆小鬼”。

在高山雪地的帐篷中睡一夜脚还都是凉的，清早不喊出发，恨不得不出被窝。一天早上，我看见陈老总早已起来了，行李卷也捆上了，正在活动身体，等着出发，至今我还保存有一张他在行李卷边上的照片。当时我想，当然会有人给副总理打行李。没想到有一天早上，我路过首长的帐篷，看见原来是张茜同志压着行李，陈老总在捆绳子。真想不到，身为副总理还自己干这种“劳动”，真是没有一点官架子，对我教育太大了。

过唐古拉山时，本来是大太阳，顷刻之间大风夹着冰渣砰砰地打在汽车篷上。在高原上，海拔5400米的唐

古拉山，远眺就是一个小山头，山上终年积雪。陈老总兴致勃勃地下车观看这一景色。当晚宿营后，我去给陈老总测血压、看眼底。老总问我知道过了唐古拉山就进入西藏境内了吗？我摇摇头，确实不知道。在烛光下，老总讲起了文成公主。他说大约是七世纪唐太宗时，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施行了羁縻政策，把文成公主远嫁给吐蕃（现西藏）王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当时过了日月山，两眼泪不干……但是她带去了当时吐蕃没有的谷物、果品、药材、蚕种、天文历法书籍等等。对繁荣西藏和边疆的安宁，起了很大作用，西藏人是很崇拜她的。至于什么叫羁縻政策，我当时没敢问还是后来查阅历史资料才知道的。原来是唐代的民族政策，就是不改变被征服民族的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任命他们的贵族为州府的都督刺史，继续统治本民族。这个政策在以后历代中也用过。后来我们参观拉萨大昭寺时，看到寺内供奉着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巨型塑像，文成公主像的头上、颈部和手上披满了群众献上的哈达。在大昭寺门口还保存着文成公主亲手种植的一棵大柳树，称公主柳，可见藏民对她的爱戴。历史证明汉藏两个民族有千年以上的友好关系，西藏从历史上从来就是中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少数人企图分裂西藏是不会得逞的。

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中央代表团团长陈毅宣读了国务院命令并代表国务院授印。这一天，祖国的飞机从北京出发飞临拉萨上空。当地的藏民们第一次看见飞机，纷纷喧嚷：

“摩托车上天了”。筹委会成立活动于5月1日胜利闭幕，为了庆祝五一节，在布达拉宫前面的广场上将举行盛大集会。头一天晚上，陈老总叫我去看病，正好赶上他和张国华司令员等首长们在吃夜宵，老总非留下我吃饭不可。有生以来，我哪儿和这么高的首长一起吃过饭呀，我走也不好，留下又胆怯，真是手足无措了。为了打破僵局，陈老总问我：“明天开大会，你看我穿什么衣服好啊，元帅服，中山服，还是普通军服？”我哪里敢搭腔。于是老总又问我：“你见过元帅服吗？”“没见过”我答道，“那你来看看”，他领我到另一间屋，看见床上摆的几套衣服，我真是开眼界了。然后老总又叫我坐在他身边吃夜宵。记得有鲜黄瓜，老总告诉我这是空运来的。我吃完这顿饭也没敢抬头，菜全是陈老总夹给我的。饭桌上他还告诉我，当个外交官一定要有一付好“下水”，他的食欲很好，能喝酒。堂堂国务院副总理对一个刚毕业的年青医生如此关心爱护，没有一点架子，而且总在设法使年轻人放松、自如，真是让我终生难忘。

5月14日，陈老总又专程去日喀则访问，还到藏民家里作客。5月26日老总乘飞机回北京了，而我又参加分团到柴达木、玉门、冷湖、范崖去慰问石油工人。

回北京后的当年冬季，我去看望了陈毅副总理。他老人家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工作情况。以后因为陈老总工作很忙，我不忍心去打扰他，就写了几封信去问候他，每次都由秘书给我回了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再也没

有机会见到他了。1972年当陈老总逝世的消息传来后，我手捧报纸，无声的泪浸润了半个版面。我想如果不是当时“文革”那种特定的条件，按他的性格和身体是不会早逝的。我既无资格见到他的遗体，更没条件参加追悼会，只有牢记他的教诲。后来得知张茜同志病了，而且是肺癌，我又有同样的想法，她年轻，更不该患这种病。1974年张茜同志也去了，留给我的是永远不断的思念。

35年过去了，陈老总的风采和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如今我已退休了，陈老总的革命乐观主义、处处为人民的精神和敢于同国内外敌人斗争的气概，还在有力地激励着我。虽然我也到了晚年，但还在努力发奋，不愿虚度年华。我要发挥余热，继续为保障人民的健康服务。

1990年11月

关于我的伯祖父易 象与田汉的一些情况

易海云

一、易家与田家

1979年4月，表伯父田洪（田汉之弟）来京参加田汉伯父追悼会，会后居京有半年之久，其间不少人找他了解田汉伯父生平情况，我亦和他交谈多次。临回长沙时，我写了两首诗送给他，其中一首是：

与公三代论亲交，家住穷乡一望遥。
苦度生涯同命运，饱经时难共飘摇。
雄才有符凭翁婿，捷足难登愧我曹。
松柏岁寒增劲拔，顶天呼啸立风涛。

诗中所说的“三代论亲交”，概括了易家与田家的基本关系。的确，易家与田家的关系是至深的。

我们易家的老家原在湖南长沙东乡枫林港附近的花果园，屋名三字墙，又叫易家老屋。居住的都是同姓同宗的易家，共有十几家。这一带地势平坦，河渠水网纵横，长沙把这种地带叫做垸里，而把山区叫做冲里。离

三字墙约四、五里地，是田家墩，又叫毛坪，与易家不过一望之遥，居住的都是同姓同宗的田家，那便是我表伯父田汉的老家。

易家和田家的关系要从我的姑祖母一代算起。我的姑祖母名叫易克勤，生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11月11日。十六岁嫁到田家，丈夫田禹卿，只十五岁，在外地当厨工。姑祖母二十岁时生了一个男孩，但小孩不到三个月就发脐带风死了。到了二十六岁，1898年3月12日，生了田汉，取名寿昌。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一叫寿康，即田洪；一叫寿麟，又名田沅。

易家和田家都是穷苦人家，开始时，易家比田家更穷一些。我的曾祖父名易道生，十八岁时便出去当长工，后来回家，以种地、织绢为生。曾祖母娘家姓蒋，八岁到易家做小媳妇。一共生了四个孩子，第一个是我的姑祖母易克勤。第二个是个男孩，两岁时淹死了。1881年4月17日生了第三个孩子，取名易象，字梅臣。后来又生了第四个孩子，取名易震，字虎臣，这便是我的祖父。

伯祖父易象，夫人陈氏，生有两个女儿，大女易国瑜，适粟家；二女易漱瑜，生于1903年，比田汉小四岁。1919年秋与田汉一同到日本留学，1921年2月与田汉结婚，1925年末病逝。只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田海男。所以，易象既是田汉的舅父，又是田汉的岳父。但田汉对易象只称舅父，不称岳父，原因是田汉与易漱瑜结婚时，易象已被湖南反动军阀赵恒惕所杀，所以一直只称舅父。